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李良玉 著

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014009489

D092.5
46

大学史学丛书
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李良玉 著

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北航

C1698197

D092.5
46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李良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480-8

I. ①转… II. ①李… III. ①文化思想—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集 IV. ①G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4021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棫、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思想的意义	1
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5
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16
新文化的起源	28
从辛亥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	39
走出“五四”启蒙的困境	50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转型	57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道统思潮	63
儒学道统在近代中国的崩溃	75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历史变迁	84
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演进	98
制度文化、激进改革与政治合法性	110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125
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 ——再论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140

失败的革命？

——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中的辛亥革命评价	153
民族融合的新起点	182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	189
“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	20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	
——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	217
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	232
160 年来的中国思想界	241
20 世纪的思想反思	247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	252
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257
驳“文明冲突论”	261
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之路	266
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中的传统问题	272
论淮河文化	283
论皖江文化	289
土司与土司文化研究刍议	296
我对新闻史研究的理解	302
关于文化研究的几点意见	309
江亢虎早期政治思想研究	313
廖仲恺政治思想简论	325
吴稚晖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论纲	336
后记	347

思想的意义

思想是人的思维活动对客观存在作出反应的过程和结果。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一点。

第一,思想是人的思维活动,是人通过感觉和知觉接触客观对象以后在心理意识方面对它进行的一系列分析、判断、推理和概括。从这个层次上,可以通俗地说,思想就是考虑问题,或者说就是考虑问题的能力。思与想又有区别。金岳霖说:“思想者中间,有善思而不善想的,有二者兼善或兼不善的。无论如何,它们有区别。”^①金岳霖称思为思议,想为想象,思议的内容是意念或概念,想象的内容是意象。他认为,“想象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体的特殊的东西,思议的对象是普遍的抽象的对象”。^②这个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思与想,或者说思议与想象,都是有一定的范畴的,漫无边际的思或者想不在讨论的范围。“思”常常是就某个特定的具体事物而思考,这思考当然也可能包含想象的内容。“想”一般是思的延伸和扩张,即由思考某一具体的特定的事物,而联想到其他事物。在这里,不应把个别与普遍、具体和抽象、行为和意念、特殊和一般等等范畴的对立绝对化。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互相渗透的。也许可以说,“思”比较偏向于逻辑性,而“想”更偏向于形象性。《说文解字》认为,“思”的含义是“深明也,通也”;而“想”则是对“思”的向往和觉悟。由此可知,“思”、“想”两字合用,表示人的思维活动的含义的时候,除了具体的逻辑的分析归纳以外,还包括以具体事物为起点、中介或思维背景的一系列可能的发挥、假设、联想和构幻。

第二,思想是一种系统的知识。从根源来说,知识来源于实践,所谓“实践出真知”,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途径来说,知识来源于揭示事物发展的认识方法。

①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7页。

② 金岳霖:《知识论》,第298页。

知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哥白尼以后,“地球环绕太阳转”是新知识,今天,它是妇孺尽知的常识。结合知识的历史过程,更能看清认识方法对于知识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懂得二十四节气,会耕作,终生从事农业生产,可能是个种田的好手,但不会成为农学家。知识的历程是技能、技术和科学。人们在生活、生产和其他社会实践中,首先在自然、生活和生产劳动中,发现某种共同现象,掌握某种技巧,积累而为经验,经过不断总结,成为某种技能。这种技能经过继续实践、修正、改善和宣传,就可能成为关于某一方面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技术。由技巧、经验而上升为技能,这是知识的初级形态。由技能转化为技术,是知识最终从实践中抽象出来,并且获得社会公认的标志。亚里士多德说过:“经验很像知识和技术,但实际是人类由经验得到的知识和技术。”又说:“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①

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三百年中,西方发生第一次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知识革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都纷纷建立起自己宏大而严密的知识体系。边沁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繁忙的时代,知识正在迅速地向着完整的方面发展,尤其是在自然界方面。好像每一件东西都正在被发现有改进。地球上最遥远的和最偏僻的角落都被踏遍、被开发了。空气中生气勃勃和精致奥妙的成分最近已经被分析出来,并为我们所知道。其他的一切纵使都不存在,光是这些也足以明显地证明这一令人高兴的真理。”^②

这是那个时代科学伟力的振奋人心的记录,从技术上升到科学,这是人类知识的一个质的飞跃。在本质上,技术是制造物质产品的工程方法,或者广义地说,是人类通过理性获得的,在一切实践活动中赋予具体目标以现实性的各种有效方法的总和。而科学,则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对物质运动规律的揭示和说明。它把物质、生命和宇宙统一为一个巨大的、互相联通的信息场,从而使人的能力和物质的能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和转换。科学的发展是思想的进步,一部自然科学史,就是人们对自然提出疑问、寻找答案的历史;一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史,就是人们对人类自身,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设问和解惑的历史。凡思想,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对象和意义,即对自然规律或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同方面、层面或局部,给予尽可能精确或者符合情理的说明。应当说,思想代表了人类思维能力所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页。

② [英]边沁:《政府片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2页。

获得的成就。

思想是人最重要的精神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标志,也是人最高级、最丰富、最宝贵、最深刻的能力。思想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有四种存在形式。

第一,思维的形式。处于思维状态的思想,是知识的心灵的形态,是人们对于自然世界、客观事物或者某项实践过程及其有关因素、条件、环节、趋势的分析和预设。处于思维形态的思想,可能是一个反复的酝酿过程,但是属于思想的原生阶段,具有非常活跃的性质。

第二,文字的形式。人们经过初步的或者深入的思想酝酿,把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即对某一问题思考的过程、要点和结论,记录、整理或者发表出来,就变为由文字表达的思想。这是思想的定型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思想实现了信息化,成为可以由文字符号传达的东西。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思想者的思维信息向文字信息的转换。人的思维需要借助语言文字,但思维与语言文字又有不同的特点与逻辑。思想必须以恰当的文字和语法写作的文章表达,因此,当作者记录、整理自己的思维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思维反复回忆、梳理,需要选择和调整自己采用的文字信息,以便与自己的思维对称起来,使表述更加达意。这个过程,就是作者构思、起草、修改和定稿的过程。思想形成了文字,是它成熟和定型的阶段,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为了避免思想僵化,转向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唯一的办法是永远面向实际,坚持实践,不断掌握新知识,研究新问题,开拓新视野。

第三,舆论的形式。当思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或者出版之后,就有了社会的性质,它对于人们的观念,具有极大的穿透能力。人们接受某种思想,是一种心灵的确认。这种确认,会转变为信念甚至信仰。思想一经获得群众的信任,成为群众的共识,就会演变为社会舆论。具有舆论性质的思想,常常是群众运动的重要政治基础。由于思想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观念,因此,它除了语言文字的障碍之外,拥有绝对自由的品格,也就是说,具有不受禁锢和被无条件接受的可能。

第四,政治的形式。思想具有政治的潜能。思想的政治的形式,是指思想被某种政治设计所采纳,在社会的政治层面、制度层面发生作用。这具体表现在某种思想所肯定的价值观,通过伦理、公德、规则、政策、法律,转换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这种规范,会在理念、习惯、风俗、道德、法制等不同范围内支配、调整甚至决定社会成员的行为。这样,某些个人的思想就变成了公众的意志,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力量,是个人的力量与群众的力量之间的有机联系。思想被注入社

会的权力体制,会使它的精神能量得到最大发挥,但也会导致它对自身文化本质的否定。在一个开放的健康的社会中,这种发挥不以文化垄断和堵塞思想为代价。

思想具有相对的性质。这是指:

第一,发展的性质。思想的发展,是指人的思维活动,对某一问题的考虑,所得的结论具有新的价值。首先,它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所给予的表象、范畴,进行新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从而获得了新的知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受到一系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很难达到深入、全面、无需重复的程度。同样的问题,经过再一次的考察和试验,可能有新的结论。发展的性质的另一个含义,是运用新的逻辑、方法和标准,对同一客观对象再次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也就是按照新的试验手段,去检测某一问题的解决,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和其他结果。这样,无论是试对,还是试错,都会使我们的认识更顺利地接近事物的本质,从而提高获得真理的系数。一般说来,所谓思想的能力,应当特别重视善于运用新的逻辑、方法和标准认识事物的能力。

第二,停滞的性质。思想的停滞,并非思维的停止。人们常常会对某一客观事物重复进行观察和思考,但是,如果对该事物的有关因素和条件没有新的发现,如果依然遵循上一次认识该事物的方法、标准和途径,那么,就不可能得出新的结论,就只能重复原有的思维过程。思想的停滞的性质,就是按照原有的条件和标准所进行的没有新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或者,就是干脆放弃重新思考的机会,而肯定或固守原有的认识。

第三,倒退的性质。思想的倒退,是指对某种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放弃了已经获得的正确的认识,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或者选择了某种错误的认识。造成这种倒退的原因有两种:一是不经过自己的思维活动而盲目地信从别人的不正确的认识;二是抛弃了原来获得正确认识所遵循的正确的逻辑、方法和标准而采取了错误的逻辑、方法和标准,或者在对该事物的分析和判断的过程中,忽略或夸大了原来所了解的有关因素和条件。

永远保持思想的活力,保持思想的发展的状态,是人类进步的重大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一切社会进步都离不开思想进步,而一切政治反动,都以思想停滞和思想倒退为绝对条件。

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思想史的三种形态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可以简洁地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思想具有两个意义,第一,思想是人的思维活动;第二,思想是一种有系统的知识。不论根据哪一个定义,思想都是一种智识的活动。贺麟说:“任何意识的活动,如感觉、记忆、推理的活动,如学问思辨的活动,都属于知的范围。”^①

一般来说,思想史的研究,以作为系统知识的思想为对象。思维作为人的意识活动,是经常的、活跃的,但又是不稳定的,不一贯的。它随着人的实践内容的不同而随时变换信息。所以,思想史研究不能以思维为研究对象。但是,另一方面,思想既然是一种知识,那么对它的研究,就不能仅仅限于这种知识的既定内容,而必须揭示获得这种内容的途径和思维特点。人们对某种思想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思想者本人的切身遭遇、环境和文化修养的注意,实际上就是对此种思想的具体思路的清理。因此,思想的研究又不能完全脱离对思维的考察。

思想是一种有系统的知识,有系统的知识有很多种。那么,其中哪些属于思想的范畴,因而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呢?

关于这个问题,李华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他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应当研究三个内容。第一,先进的中国人,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和国情,提出自己救国救民的方案,设计未来的美好蓝图的”;第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

^① 贺麟:《知行合一论》,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6页。

封建主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倡民主与科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进步思想”,以及它的对立面;第三,先进的中国人如何“向西方学习和摆脱历史惰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①

李华兴所提的上述内容,当然属于思想,尤其符合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所研究的内容。可是,我们却不能视之为关于思想史学科对象的最好表述。他的提法有下述两个缺陷:

第一,逻辑上的错误。我们以某个具体事物为研究对象,取决于该事物的客观实在,它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数量与质量的统一。而上述“救国救民的方案”、“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种种“进步思想”和它的对立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等等,实际上是作者通过研究近代思想而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内容,是作者从近代思想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医生以病人为服务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就是患者,而不必考虑他患了什么病;医学以疾病为研究对象,那么只要是病,都应当研究,不必规定疾病的类型。

第二,研究范围的限制。与第一点相联系,由于作者仅仅把自己研究近代思想所肯定或否定的东西作为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对象,事实上他就把这个学科对象的范畴大大缩小了。换言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有许多东西并不包括在他所讲的三点内容之中。因此,仅仅把上述三点内容作为思想史的学科对象,似乎还不够全面。

笔者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与思想存在的形式相联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知识系统中拥有思想特征的知识。它表现为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理论。理论就是概括某种知识所形成的系统看法。它是思想研究最基本的范畴。这里所讲的理论,特指思想家个人的意见。思想家在他的社会实践,包括在科学研究中,接触和认识某种现象和事物,通过系统的、严密的分析、设定和说明,作出了学理性的结论。思想史研究,就是对这一类结论的检讨。在这里,可以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主义、学说包含其中。

第二种形态——理论的衍变和发展。这里所说的衍变和发展,特指某种理论的蔓延和递进,不包括理论持有者本人对该理论肯定、否定、改善的曲折过程。这类过程,是上述第一种对象应当考虑的。

^① 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第三种形态——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群众性思想运动,是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有重大影响的、在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中流行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是理论与群众政治行为的高度聚合与释放。

社会思潮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大众性。它不是一个或几个思想家的学术思考、研究或著述活动,而是一定阶段上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性活动。第二,思想性。这种群体性活动,会形成某种价值观念,某种思想倾向,某种理论支配下的社会共识。第三,政治性。这种群众活动,是某一时期的特定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首先表现为群众政治运动。这时候为群众所接受的某种理论或价值观,能够集中反映这种社会矛盾,而群众这时候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第四,导向性。由于这种活动的大众性和政治性,所以能够及时把握时代要求,鼓舞群众的情绪,提升群众的政治愿望,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一般来说,社会思潮与社会思想,这里的思想特指以思想家个人的思想,或者其中以某一方面的思想为单元的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

第一,个体性与群体性。思想家的理论活动是一种个体的活动,他可以不介入社会,疏离于群众进行思考,而社会思潮拥有广泛的社会层面,也更贴近社会。

第二,理论性与功利性。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含有改革现实社会的动机,可是一般并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斗争。但在社会思潮当中,尤其是在社会政治思潮当中,充当群众运动的知识领袖的人物,通常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领袖;或者反过来,由于某些人物的政治领袖地位,他的某些主张与理论,顺理成章地成为群众运动的旗帜。社会思潮总是带着明确的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社会的目的,拥有强烈的功利性。它与纯粹理论家的研究活动不一样,不以构建某种理论为基本目标,而是以某种理论为工具实现社会改造的目标。本质上,它是以某种知识为先导的政治活动。

第三,系统性与庞杂性。由于思想家的理论思维,以寻找知识的逻辑,构建知识的完整体系为目标,所以具有单向、连续和周密的特点。社会思潮是大众的行为,大众之中又可能包括不同的利益集团,抱有不同的政治要求,倾向于不同的思想主张,因此具有庞杂、多元和多义的特点。

理论、理论的衍变与发展、社会思潮,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它们三者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理论是基本单元。思想家总是以其理论的知识含量与社会价值规定其在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理论的衍

变与发展是思想的辐射与延续,是人类求知本性的生动表现。古往今来,那些灿若群星般的思索者,是人类大智大勇的灵光闪现。社会思潮是理论的普遍开花,是社会成员的个性的普遍张扬,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深刻辩护。

思想史的五类内容

既然理论的价值如此之大,那么,作为思想史应当研究的理论有哪些呢?笔者认为,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科学人文。

这里所说的科学,特指自然科学,因此,所谓科学人文,亦即科学中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价值。它主要体现在自然观、科学方法论和科学价值的启示当中。

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的假设。当自然还不曾被撩开它的神秘面纱的时候,人类就已经用喜、怒、哀、乐、声、数、秩序、和谐等种种情感和智慧来模拟它。这种模拟越来越大,越来越细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人类自然观的变动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理性基础存在深刻联系。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获得科学进步的认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理论总结。古代自然哲学的方法是观察、推理和数学模拟的统一。近代科学的方法是观察、实验和数学分析的统一。它使人类锐利的目光从此可以精确地看清任何细小的微末,无论多么复杂的物质结构,及其变化万千的运动规律。詹姆士曾经这样形容科学方法论对人们的影响:

“人们发现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初表现的各种一致性,即第一批定律时,为它们所带来的那种明确、优美和简单性迷住了,因而相信自己已经真正认识了上帝的永恒思想。上帝的心,也在三段论里明确地反映出来。上帝也用圆锥截面、方根或比率来思考,并且也像欧几里德一样按几何学原理进行工作了。上帝创造出凯普勒定律,使行星照着运转,使下坠物体速率的增加和时间成正比;上帝做出正弦律,让折光遵守;上帝把动植物分纲、目、科、属,并且确定它们的远近关系;上帝想出各种事物的模型,并且规定出它们的变种。”^①

^① [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32页。

这正是通过科学方法所获得的自然的奥秘,一个生气勃勃的科学公园。今天,科学方法论已经无孔不入地、全面地渗透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这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因为不会再有人盲目地信任什么披着“美丽”皇服的权威、什么独霸智慧的经典,正如詹姆士在20世纪初就断然宣称的那样:

“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但是从某一个观点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用的。”^①

科学的价值启示是由于自然科学的革命观念所引起的原有价值体系的塌方和新观念的萌芽。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一部天文学著作,但是它对中世纪神学发起了挑战,重新点燃了人类主体精神的熊熊火炬。随着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它又无坚不摧地打开了东方智慧的宝库。严复曾经这样阐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

盖自古人群之为制,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在上以为吾覆,有其至卑者在下以为吾践。此贵贱所由分,而天泽所以位也。乃自哥白尼之说确其不诬,民知所向对举而严分者,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绝远而矣,积虚而矣,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间,欧事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非由此乎?^②

科学人文是思想进步的前提,是促进社会伦理与政治变革的极其活跃的因素。人类由蛮荒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真正标志是伦理的形成。用伦理去附和、解释自然,是人与自然的第一次统一。把伦理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是人类提出的深刻的精神诉讼,它维护了人的尊严,推动了科学的继续发展。本质上,它是科技伦理的序言,开始了自然与伦理的哲学统一的更加复杂的证明过程。这是人与自然的第二

^① [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第32页。

^② 严复:《政治讲义·自叙》,《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